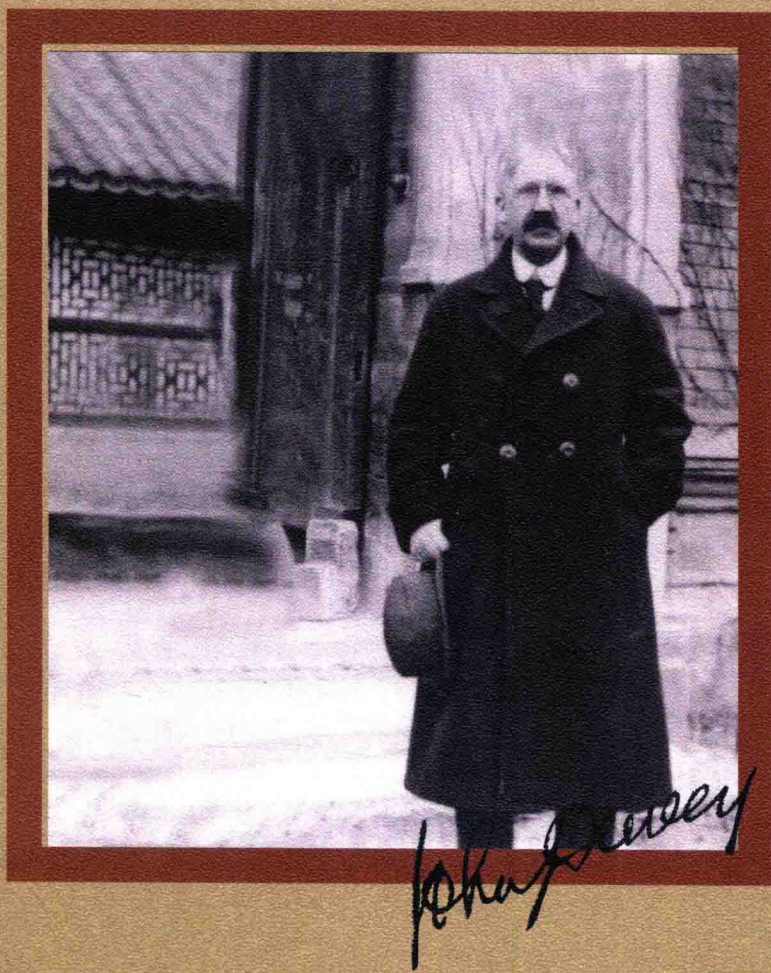


杜威选集 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中国心灵的转化

杜威论中国

顾红亮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威选集

主编 刘放桐 陈亚军

中国心灵的转化

杜威论中国

顾红亮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顾红亮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杜威选集/刘放桐, 陈亚军主编)

ISBN 978-7-5675-6885-3

I. ①中… II. ①顾… III. ①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思想评论—文集

IV. ①B712.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9578 号

杜威选集

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

主 编 刘放桐 陈亚军

编 者 顾红亮

项目编辑 朱华华

审读编辑 王 海

责任校对 王丽平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1.25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885-3/B·1095

定 价 13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编序

在实用主义家族中,杜威是一位祭酒式的人物。他不仅最系统、全面地阐发了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主张,而且从实用主义出发,在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宗教学、逻辑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一系列领域,提出了许多极具影响力的观点。是杜威而不是皮尔士、詹姆斯,使实用主义不再只是扶手椅中的哲学而成为穿越学院高墙、塑造美国社会的文化思潮。今天,这股原本产自美国的思潮,早已成为西方思想学术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杜威的思想不仅受到他的本国后裔,而且也受到欧洲乃至世界思想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国人来说,杜威这个名字毫无疑问处于西方哲学家名册的显赫位置。这当然首先是由于他个人与中国的特殊因缘,但更值得一提的恐怕还是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诸多交叉重叠。杜威哲学与中国儒家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同异,早已为很多学者所关注。研究杜威哲学,有助于促进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本选集是在《杜威全集》(38卷)中文版的基础上完成的。《杜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很好的反响,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一是体量太大,从购买到收藏,都极为不便;二是内容太杂,从浩如烟海的著述中把握杜威的思想,也殊为不易。正是为了帮助读者解决这些困难,我们编纂了这部《杜威选集》(6卷),分别涵盖了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价值论/伦理学、政治哲学/法哲学、宗教学/美学。鉴于杜威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我们专门增加了《中国心灵的转化——杜威论中国》卷。

基于篇幅的考虑,有些文献虽然重要但难以收录,我们只选取了其中的相关部

分,单行本和教材的内容则尽量不选或少选。另外,杜威的探究逻辑是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一部分放在“逻辑学”名下,恐会导致一些误解或争议,鉴于杜威的探究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于他的哲学方法论范畴,因此,我们将这部分内容统一纳入“哲学卷”。

我们力求在体例上保持一致,但并不强求一律。由于“哲学卷”的涵盖面更广,内容更加博杂,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加以编纂具有难度,因此分卷主编用现在的年代划分方式对其加以整理。另外,“杜威论中国卷”也不适宜主题分类的方式,我们同样尊重分卷主编的意见,采用了目前的编纂方式。各卷主编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为选集的选编付出了很多心血。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华东师大出版社历来重视杜威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为《杜威选集》(6卷)的问世提供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朱华华女士做了大量的繁琐工作。我们对此也深表感谢。

刘放桐 陈亚军

2017年7月31日

编者序

对于中国人来说,杜威是一个令人爱恨交加的美国哲学家。他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中国学生,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陈鹤琴等。他应邀来中国访问演讲两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他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教育、哲学和文化发展趋向。但在1949年后,杜威作为实用主义的大师曾遭到口诛笔伐,实用主义作为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被学术界拒斥,成为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以后,被丑化了的杜威的哲学家形象逐渐得到纠正,实用主义哲学得到重新评价,恢宏巨著《杜威全集》正式出版。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现当代中国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学者关心实用主义哲学对现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关心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的影响,但是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内容:杜威所作的中国论述,或者,杜威的中国话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杜威被当作一位外来的哲学家,来中国传授世界性的知识和思想。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杜威对于中国政治和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没有注意到杜威对于中国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没有注意到杜威给读者留下几十万字的中国论述。

杜威在中国访问的两年间,写下大量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杜威全集》一共收录有关中国论述文章53篇,包括时论、论文、游记、书评、对来信的答复、解密报告等。这些英文文章大多发表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亚洲》(*Asia*)等杂志上。编入本选集的文章不限于《杜威全集》的53篇作品,还包括杜威夫妇所写的部分家信和在中国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部分演讲。

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的主题相对集中,都与当时中国的外交、内政、思想文

化、教育等话题相关。有讨论中国政局变动的,有讨论“五四”运动的,有讨论中美、中日关系的,有讨论中国经济的,有讨论中国文化和教育的,有讨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笔者把杜威论述中国的文章、书信和演讲大致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世界中的中国”,讨论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外交关系和中国的外交政策。第二部分,“五四”运动,涉及杜威对“五四”运动背景、过程的描述和评论。第三部分,“中国的危机与出路”,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解决对策、发展前景。第四部分,“中国人的心灵”,涉及杜威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认识,杜威对中国文化、教育问题的看法。

在这些文章、书信和演讲中,杜威描述了当时发生的大量的中国现象、事件和运动,夹杂着他的理解、评论和对策建议。当然,也包含着他对一些中国人、一些中国现象的批评。他的批评是善意的,是基于希望中国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阅读杜威的这些文字,可以深切感受到,他对中国怀有浓厚的兴趣、友好的态度和热烈的期待。

鉴于杜威的中国话语的内容比较丰富,本序言不准备全面介绍杜威的观点,只想与读者交流讨论一个背景性话题:杜威在“五四”运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来到上海,开始两年之久的中国之旅。杜威对“五四”运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般认为,杜威在北京、南京等地目睹了“五四”运动的许多场景,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见证者。我们认为,不仅仅如此,他还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当然,他的参与方式是特殊的。简要地说,他以两种方式参与了“五四”运动。

第一种方式是演讲与交流。在“五四”运动期间和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许多场演讲,到过 11 个省,参观了很多学校、工厂和城市,与当地的官员、学生和知识分子交流。他的演讲和谈话直接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学生和知识分子,所以,胡适说:“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我们还可以说,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①

第二种方式是写信与写文章,参与对“五四”运动的报道与评论。杜威及其夫人写了不少家信,家信里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五四”运动的进展情况和他们的直

^①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 1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60 页。

观感受。例如,1919年5月23日,杜威夫妇在写于南京的家信里说:“我相信任何人都不能预测今后的政治局势;我们在此的三星期中,眼见学生们的活动已引起了一项全新且无法计数的动力因素。……中国人没有一点组织能力,更没有团结内聚的决心;而今学生团体来插手一些事务,于是一切都显现出新的吵杂与新的气象。”^①

又如,1919年6月1日,杜威夫妇在家信里说:“我们正好看到几百名女学生从美国教会学校出发去求见大总统,要求他释放那些因在街上演讲而入狱的男学生。要说我们在中国的日子过得既兴奋又多彩的确是相当公平,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但通常一个新国家的诞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早上我们所见到的那群演讲的学生,听说后来全都被捕了,而他们的口袋里早已带好了牙刷和毛巾。有的传言则说事实上不只两百人被捕,而是一千多人,只北平一地就有十万人罢课,方才出发的那些女孩子显然是受了她们老师的鼓励,许多母亲都在那里看着她们走过。”^②杜威夫妇在家信里对于学生运动的描述,大多带着同情和鼓励的笔调。

在中国访问期间和回到美国之后,杜威还撰写了不少英文评论文章,例如《中国之新文化》(New Culture in China,《亚洲》第21期,1921年7月)、《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The New Leaven in Chinese Politics,《亚洲》第20期,1920年4月)、《中国民族国家情感》(Chinese National Sentiment,《亚洲》第19期,1919年12月)、《中国思想的转变》(Transforming the Mind of China,《亚洲》第19期,1919年11月)、《学生反抗的结局》(The Sequel of the Student Revolt,《新共和》第21期,1920年2月25日)等,这些英文文章既评论中国的时政局势,向外界报道“五四”运动及其后续的政治、文化运动,也包含着对“五四”运动的理性反思。这些文章是杜威运用实用主义哲学思考中国问题的尝试,是对杜威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的一个应用性诠释,可以看作是杜威的实践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些文章也应视为“五四”话语的组成部分。杜威有些评论文章直接被译成或被摘译成中文,在中文的报纸上发表,例如《杜威论中国现象》(《晨报》1921年2月24日)、《广东印象记》(《晨报》1921年6月16、17、18日)、《杜威博士论中国工业》(《民国日报》1921年1月

^① 杜威夫妇:《中国书简》,王运如译,台北:地平线出版社,1970年,第24页。

^② 同上书,第33—34页。

18、19日),它们直接影响中国读者的思考方式。

对杜威关于中国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胡适有一个积极的评价,他指出:“对于国外,他(指杜威——引者注)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国》(*The New Republic*)和《亚细亚》(*Asia*)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①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使用了杜威的书信和文章提供的不少史实,来描述“五四”运动期间的中国文化和政治变革情况。^②从杜威的书信和文章中可以看出,杜威显然被“五四”运动及其蕴含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胡适说:“引起杜威夫妇那么大的兴趣以致于他们改变了原定要在夏季几个月以后就回美国的计划,并且决定在中国逗留整整一年的,就是这次学生运动以及它的成功与失败的地方。”^③在这方面,杜威不是唯一的例子。当年陪同罗素访华的 Dora Black 女士也有类似的感觉,她在致周策纵的信里说:“我自己也确感觉到那个时代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我已从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④用这话来形容杜威对“五四”的感受,恐怕也不为过。

在同一篇文章 *New Culture in China*(《中国之新文化》)中,杜威用 *the student revolt*、*the movement of May 4*、*the upheaval of May 4* 等词语描述“五四”学生运动。杜威还写了一篇题为 *The Student Revolt in China*(《中国的学生反抗》,《新共和》第20期,1919年8月6日)的文章,文中还用到 *the student movement* 一词。*revolt* 一词有反叛、叛乱的意思,*upheaval* 一词有动乱、突变的意思,*the student revolt*、*the upheaval of May 4* 等英语用法表明学生运动带有激烈的动荡、反叛的意思,表明此运动带有剧变性和反叛性。在这些描述中,杜威有可能借用了别人的用法,我们无法确定哪个用法是借用的,哪个用法是他自己使用的。但是,从总体上看,杜威并用这些用法,至少表明两点:第一,当时他对“五四”运动的认识还带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二,多少揭示出“五四”运动是一场巨变,是一场触及中国现代

①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

② 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7、228、247、249、314—315、499页。

③ 胡适:《杜威在中国》,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5页。

④ 转引自朱学渊:《周策纵先生的才具和苦难》,《东方早报》2008年11月9日“上海书评”第18期。

性改造深度的巨变。

我们不否认,杜威在演讲、书信与文章中表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看法和评论可能受到了胡适、蔡元培、博晨光(Lucius Porter)等人的影响;我们同样不否认,杜威作为一个成熟的哲学家,有他自己的理解力和判断力。他对他所接触到的中国人和传教士所持观点的吸收是有选择的。总的看来,他基本上站在同情“五四”学生运动的立场上作出自己的评论,这些评论理应成为“五四”话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杜威也有理由被视为“五四”的参与者。^①

在中国的学术界,杜威论述中国的文章、书信和演讲对于研究杜威哲学、研究现代中国以及两者的关系特别有意义。阅读这些文献,可以认识一个完整的杜威的中国话语体系,认识杜威是如何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是如何正视中国面临的困局的。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路径,思考杜威自身的思想是否以及如何受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了解杜威关注中国问题的哪些方面或领域,了解杜威从中吸收哪些因素或观念,了解杜威思想的细微变化与中国之行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推进中美人文对话交流,而且有助于认识一个多彩的现代中国思想世界。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刘放桐、陈亚军、王成兵、张国清、冯平等多位教授的指点,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华华编辑的协助,特此表示感谢。

顾红亮

2016年8月31日上海

^① 相关内容的讨论可参见顾红亮:《“五四”的参与者杜威》,《文汇报》2015年5月8日。

目 录

主编序 / 1

编者序 / 1

第一部分 世界中的中国 / 1

东海的两边 / 3

理想主义的不可信 / 8

在中国进行的国际对决 / 13

美国在中国的机会 / 19

给中国下药,我们也有份 / 25

中国的噩梦 / 30

远东的僵局 / 34

银行团在中国 / 41

美国在岔路口 / 47

华盛顿的各项议题 / 58

中国的诉求中表现出了精明的策略 / 72

对中国的四条原则 / 75

地洞 / 77

山东问题的各个角度 / 80

会议和一个快乐的结局 / 83

中国人的辞职 / 87
条约的三个结果 / 90
关于《四国条约》的几点事后思考 / 92
回复《美国的中国政策》 / 96
美国和远东 / 98
相当虚假的小谎言 / 101
我们应该像国家对国家那样对待中国 / 105
中国与大国势力：Ⅱ. 干涉——对民族主义的一个挑战 / 108
和平——依据《巴黎公约》或《国际联盟盟约》? / 110
国际组织必须进行制裁吗? 不 / 115

第二部分 “五四”运动 / 137

中国的学生反抗 / 139
学潮的结局 / 144
中国政治中的新催化剂 / 149
我们正目击一个国家的诞生 / 156
有些地方他们却比我们更加民主 / 158
我们看到了中国活生生的一页史实 / 160
中国真正的觉醒 / 162

第三部分 中国的危机与出路 / 165

中国的军国主义 / 167
山东：从内部看 / 172
中国的政治剧变 / 182
工业中国 / 186
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 / 191
中国是一个国家吗? / 194
中国内地 / 200
分裂的中国 / 205

再访山东 / 214
中华民国成立十周年纪念 / 220
联邦制在中国 / 222
中国与裁军 / 227
中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市场? / 230
真正的中国危机 / 234
广州印象 / 237
南游心影 / 241
致在美国的中国朋友们 / 246
致中国人民 / 247
与孙中山先生同桌晚餐 / 249

第四部分 中国人的心灵 / 251

中国心灵的转化 / 253
中国的国民情感 / 261
是什么阻碍了中国 / 271
老中国与新中国 / 278
中国的新文化 / 290
像中国人那样思考 / 301
美国与中国人的教育 / 310
中国与西方——评《中国问题》 / 315
论中国美术 / 319
五团体公钱杜威席上之言论 / 322

第一部分 世界中的中国

东海的两边^{*①}

从日本到中国只需要三天便捷的旅程。很可怀疑,是否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伴随另一种同等距离的行程会使人看到政治倾向和信仰上出现如此彻底的变化。它肯定要比从旧金山到上海的旅行中感受到的变化大得多。区别之处还不在于生活习惯和方式上的改变,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它关涉到观念、信仰以及对当前同一个事实所散布的传言:日本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特别是它对中国的态度。人们在日本到处可以发现某种无常、犹豫甚至脆弱的感觉。那里正弥漫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经紧张的气氛,国家正处于变化的边缘,但又不知道变化会把它引向何处。人们已感觉到自由主义的到来,但真正的自由派分子被形形色色的困难所包围,尤其可见于为他们的自由主义套上一件神权罩袍的问题,统治日本的军帝国主义分子已如此老练地把这件罩袍扔给了皇室和政府。但一个人到达中国后,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感受到日本遍地渗透的势力,它正以命定般的力量发挥作用,以便毫不迟疑地达到那种结局——由日本用它那最终同化的观点来主宰中国的政治和工业。

我的目的不是对形势的现实性加以分析,或者去查究中国这种普遍存在的感情是不是某种集体幻觉或具有事实根据。现象本身就是值得记录的,纵使它不过是一种心理现象,必须把这个事实认作既涉及中国人也涉及日本人。首先,就感受

*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46—150页。

①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第19期(1919年),第346—348页,文章注明的发出日期和地点是南京,5月28日;重印于《中国、日本和美国》(*China, Japan and the U. S. A.*)(纽约:合众出版公司,1921年)和约瑟夫·拉特纳编,《人物与事件》(*Characters and Events*)(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29年),第1卷,第170—176页。

到的不同心理气氛而言,任何了解日本方方面面情况的人都知道,它是一个拘谨缄默的国度。一个一知半解的美国人会告诉你,这是装装样子的,是在对外国人进行误导。而一个明白人则懂得,这种态度之所以会向外国人展示,只是因为它扎根于日本的道德和社会传统之中;日本人可能真有那么回事,那就是说,他们更可能与一个怀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进行交流——至少可以在许多事情上进行交流,而不是在他们彼此间进行交流。拘谨的习性深植于所有的礼仪、习惯和传承下来的日常仪式之中,深植于性格力量的观念之中。只有那些受到外国影响的日本人,才会去驱除它——许多人又会回复原状。说得温和点,日本人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民族,他们拥有的是做事而非闲聊的天分。

因此,当一个日本政治家或出访的外交官用一种非常冗长、坦率的话语阐述日本的目的和做法时,一个长期待在东方的政治学研究者马上会警觉起来,更不用说产生怀疑了。最近的事例是如此极端,以至它看上去无疑是出于一种狂热而非信念。但中国国内的学生如果愿意体察当前气氛的话,他们就不能不严肃地来看待这些貌似真实的狂热。越洋电报对后藤男爵在美国的某些讲话作了片断报道。在美国的环境中发表这些讲话,无疑是为了取得这样的效果,即让美国打消有关日本方面持有任何不正当野心的疑虑。在中国,人们则会把它们看成是某种宣告,它们宣告日本已完成了同化中国的计划,一种深谋远虑的试探性吞并行动即将开始。读者事先应被允许对他所感觉到的事实本身持有怀疑,也可以对我就有关报道所做的纠正表示怀疑,这些报道对所称的事实信以为真。他的怀疑论,不会超过我处在他的位置所感受到的那种怀疑的情况。但必须指出,这类陈述引起的怀疑,以及最近对外务大臣内田和石井男爵的访谈,在中国已被当作产生某种普遍信念的证据,即日本的外交对东方国家是一个样,对西方国家又是一个样,它对西方国家说的话必须反过来才能被东方国家读懂。

不管其他方面如何,中国总是一个不存在隐私的国家。有一句谚语称,别指望在中国长久地保持秘密。中国人说起话来要比他们做起事来更为得心应手——尤其是谈论政治方面的话题。他们擅长揭露他们自己的缺点,他们以非同寻常的、合情合理的态度对他们自己的弱点和失败进行详细评论。他们沉溺其中的毛病之一,是喜欢寻找某些积极行动的替代品,喜欢避免介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行动过程。人们几乎会感到诧异,是否他们自我批评的力量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替代品。他们对所有事件都要坦然地诉诸喋喋不休地评说。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总会有